

在故宫看见中国史

祝勇

十八学士登瀛洲

李世民本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他有一种观点，叫“戡乱以武，守成以文”。他做秦王时，就在长安城里设立了文学馆，身边围绕了一大批文化人，有人称他为“大唐诗歌俱乐部主席”。文学馆里收纳的贤才，包括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苏世长、姚思廉、薛收、褚亮、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勖等十八人，并称“十八学士”。这十八人分成三组，每日六人值宿，与李世民一起讨论文献、商略古今，天下士夫，无不以入选文学馆为无上荣光。这十八学士，从此被称为“十八学士登瀛洲”。瀛洲者，神仙之所居也，《史记》中说：“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人文学馆，相当于登上了海上仙山，天下士人，没人不对此垂涎三尺。

画家阎立本专门为李世民身边的这个文化群体画像，就是《十八学士》卷，绢本设色，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图像史的方式，为唐代重文风尚提供了历史的证物。

唐太宗的时代过去了，“十八学士登瀛洲”的精英与辉煌流逝了，却仍留下儒者的风范供后人追忆和怀想。“十八学士图”后来成为中国绘画的经典题材，一代代画家以自己的绘画语言，不断对这一历史记忆进行重构。《宋人十八学士图》轴四件，画面上的英才大儒、文人高士，坐在松柏槐荫之下，庭院中芍药鲜艳、萱花怒放，人们或围几而坐，或抚须而立，赏花论诗，弈棋品茶，神态悠雅闲适，仿佛沉醉于画境中，无比风流俊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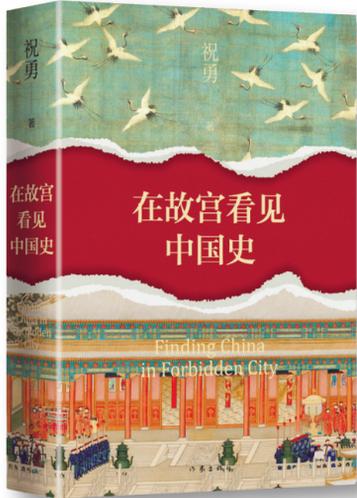
宋徽宗也绘有《十八学士图》卷，画上文人或游园赋诗，或奏乐宴饮，或戏马观鹤，气氛比前面所述的《宋人十八学士图》轴热闹许多，人物造型姿态丰富而生动，富于动感，彰显了当时文人学士轻松愉悦的生活情趣，也把他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的综合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其他还有南宋刘松年《十八学士图》卷，画上人物同样神态生动，衣褶清劲，精妙入微。

以上所说的这些《十八学士图》，都曾是清宫收藏，录入《石渠宝笈三编》，现都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李世民开创的“十八学士”传统，在后世也继承下来。唐玄宗开元时，就曾延续这一传统，在上阳宫象象亭，以张说、徐坚、贺知章、赵冬曦、冯朝隐、康子元、侯行果、韦述、敬会真、赵玄默、毋奕、吕向、咸业、李子钊、东方颢、陆去泰、余钦、孙季良为“十八学士”。五代南唐国君马希范在位时，也以幕僚拓跋恒、廖匡图、李弘皋、徐仲雅等十八人为学士，号称“天策府十八学士”。

有学者评价7世纪的初唐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扬眉吐气的一段时光，630年唐将平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长推为“天可汗”，当日高祖李渊已退位为太上皇，仍在凌烟阁置酒庆贺，高祖自弹琵琶，太宗则当众起舞，这种欢乐场面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大唐的文治武功无不达其极，当时“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最为历来史家所艳称。

大唐的兴盛固然有多种主观与客观上的原因，但有一点不可忽视，即在中国的历史王朝中，唐代的知识分子政策极为优遇宽松，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唐太宗崛起于兵戈之间，他深知能在马上得天下，但不能在马上治天下，故在大唐王朝建立后积极地罗致文士。隋朝在汉代以来已废弃的九品中正制的基础上设进士、明经二科以取士，唐朝更是大力推行科举制度。科举使士人有了凭借个人才能得以晋升的机会，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士人不必再像汉代那样求推荐，也不必再像南北朝那样由门户高低来决定一生命运，个人才能已在某种程度上



上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士人的潜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

当唐太宗站在金銮殿上，看着新录取的进士鱼贯而入时，他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他们或驰骋沙场，或关心政治，终于成就了大唐既恢弘高扬又华光流丽的气概，雄视千古，成为中华民族骄傲。

唐朝是诗的王朝，作诗被看作是一项神圣的事业，要拳弄棒则低俗得多。唐诗的兴盛，政府是重要推手，因为唐朝科举取士注重诗歌。唐代科举分明经、进士两科，明经考试各部儒家经典和《老子》，进士科考试在初唐时期为“时务策”五条，涉及国家现实问题，使读书人从故纸堆中爬起来，面向社会观察、思考问题，设计解决办法。唐高宗调露二年为进士科加试了杂文、帖经，形成了杂文、帖经、策问三场考试制。所谓杂文，主要是指诗赋，不像明经科那样侧重于死记硬背，而是考察应试者的文学才华，因此唐朝科举最荣耀尊贵的是进士科。

文学史中赫赫有名的大诗人，都曾试图通过科举考试来争取“进步”，像王昌龄、崔颢、颜真卿、王维，都是开元年间进士及第的。孟郊中进士，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来炫耀自己的胜利，其实那一年，他已经46岁高龄。杜牧中进士后也不忘“嘲瑟”，及第后立刻寄诗给长安故人：“东都放榜未开花，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

黯然落榜的有孟浩然、杜甫等。孟浩然成绩不好，是因为他不会考试，临场发挥差；杜甫则是运气不好，两次考试都赶上坏考官。十二年，36岁的杜甫第三次走向考场，这一次运气更差，因为当时的宰相不是别人，正是李林甫。李宰相嫉贤妒能，所以那一届考生一个都没录取，他用一个好听的说法忽悠皇帝，叫“野无遗贤”，意思是全天下的人才都已经被朝廷用尽了，再也网罗不到了。李白没有考，是他根本没有资格考，因为唐代科举要出示身份证，也就是要核实考生身份，但李白没有谱牒，身份成谜，连祖上的名字都确认不了。还有一条原因是他家庭出身不好，他父亲是商人，从《旧唐书》中我们知道，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

至玄宗一朝，崇尚文化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唐玄宗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平衡文武关系，但并未改变士人对军事的轻视和厌恶。尤其是“府兵制”废除以后，许多人从强制兵役中解脱出来，寄情于文学与艺术。

其实李林甫也并不完全是吹牛，有学者统计，北宋

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中近90%的诗人参加过科举考试，进士及第者62人，占入选诗人总数的72%。而《唐诗三百首》中入选诗人77位，进士出身者46人。

正因如此，唐朝的诗人才成为那个朝代的主角。……他们风流俊雅，不尚暴力，其实正是代表了中华文明的精神风范。中国传统的审美记忆中找不见史泰龙式的肌肉男，而是将这种力量与担当收束于优雅的艺术与人格中。他们的美是一种从红尘万丈中超拔出来的美，只有文明之国，才崇尚这种超越物理力量的精神之美。

知识改变命运

但犹如一枚硬的两面，文化繁荣的表象背后，掩饰不住唐朝武力的衰弱，尤其是中央政权的武力衰弱。日本历史学家桑原隲藏在《中国人的文弱与保守》一文中写道：“在唐代，热衷于文官科举考试的人很多，而热衷于军人武举的几乎没有。当时军人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一家人中若有个当兵的，他的父母兄弟都会看不起他。唐代的兵役制与日本的相同，守卫京城的士兵都是从地方上挑选的，称之为‘卫士’或‘侍官’。当时，军人恶言相加的时候，便骂对方是‘侍官’。在日本的话，基本相当于‘贱民’或者‘隐亡’（火葬场焚尸工）之类。军人地位之低下真是难以想象！”

当文官士人对兵事不屑一顾的时候，以藩镇为基地的地方武装势力却在潜滋暗长。与朝廷的状况相反，在藩镇地区，崇尚的不是文化而是拳头。在实用主义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比拳头更管用。因此，在安禄山控制的河北地区，人们不相信理想，只相信拳头。谁的腰硬，谁就是爷。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在武人的支配下，河北地区无论在文化上或政治上，都与朝廷控制的区域判然有别。在河北，军事技能掩盖了对儒家经典论著学习的锋芒，成为最受重视的学习项目。在其他地方，为了参与科举考试而读书，仍被认为是提升地位的最佳途径。

他们拼命抓权，军权、财权、人事权，一个也不放过，一点不掏空了朝廷的权力。而朝廷用兵，只能依赖他们，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爆发。

“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很复杂，藩镇之强横与朝廷之文弱是一个重要的诱因，否则以安禄山之狡猾，绝不会铤而走险。“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的问题依然长期存在，不仅威胁着大唐王朝的安定团结，更让藩镇的老百姓在当地节度使的统治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以淮西为例，百姓连夜里点灯的权利都没有，互相串门就是死罪。后来朝廷军队打来，废除了这些苛法，“蔡人始知有生民之乐”。李贺写过一首《公无出门》，从中可以看到藩镇割据最真实的景象：“天茫茫，地密密。熊飏食人魂，雪霜断人骨。”

到唐宣宗时代，皇帝“雅好儒事，留心贡举”的“积习”未改，士大夫则不愿谈论军事，甚至与武将接触都觉得掉档次。五代孙光宪这样评论那个时代：“唐自大中以来，以兵为戏者久矣，廊庙之上，耻言韬略，以褻鞬为凶物，以钁钁为凶言。”秦鞬者，弓箭袋也；钁钁者，兵器也。连这些都成了不祥之物、不吉之兆，一旦遭遇战争，怎么打得赢？

当时也有人对此看不过眼，其中就包括大诗人杜牧。杜牧23岁写《阿房宫赋》，26岁作弘文馆校书郎，但与别的诗人不同，他酷爱兵法，读过《孙子》。他不是纸上谈兵，有一次献计平虜，被武宗时期的宰相李德裕采纳，大获全胜，只是由于党争，才没被李德裕重用，成就一番事业。面对这种重文轻武的风气，杜牧发表评论说，在当下，士大夫只要一论及军事，就会被认为是粗鄙怪异，即使他们的国家正遭受军事上的威胁，文士依然毫不担心，将平定叛乱之事交给武人。在杜牧看来，军队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倘若军队由饱学之士掌握，便能建立稳定的帝国；军队若由不学无术的武人统率，国家就要土崩瓦解。杜牧之后，文人谈论兵事的更是少而又少，以文成名倒是陷入了疯狂。

(摘自《在故宫看见中国史》，祝勇著，作家出版社，2023年8月)

5月15日，长假过后的第一个周六。上海市区气温陡高，阳光饱满。

徐家汇的汇洋商厦里人流如梭。下午3点10分左右，张约和徐鸣之已经出现在中央大厅，向咖啡吧走来(据6号服务生回忆，应该是这个时候)，尽管约定的时间是3点30分，还有足足20分钟。两人手里都没有购物袋。他们也许是约了提前在商厦东门或南门见面，本来想顺便先逛逛楼上的商铺，结果大家都没什么兴致，就直接来了约定地点。也许他们本来就是从同一个住处而来，张约或徐鸣之的公寓，起床之后，吃了早午餐，看了一会儿电视，心神不宁，彼此谁也没办法安抚谁，于是干脆决定早些出门赴约。

张约35岁，是大江集成电路株式会社的高级工程师。如果不是今天的表情，他应该是看上去比较开朗的类型，长方脸，眉毛架眼镜，头发剪得很短。不规则条纹的灰色T恤衫，一双运动鞋。175厘米的中等身材，还没有发胖。他一边向咖啡座走近，一边不停地环视四周，以致错过了咖啡吧的入口，又不得不折回来。

徐鸣之30岁，《新申晚报》的副刊编辑。身材修长挺拔，忽略鞋跟应该也有168厘米以上，五官虽算不上漂亮，但借着出奇白皙的皮肤，显出一种特别的清秀。苹果绿的大领针织衫，很衬她的肤色，扎着马尾，修身长裤，高跟鞋。与张约相比，她似乎是细致打扮过，脸上有得体的淡妆。她挽着灰色的手袋，走在张约旁边，几次抬起右手，似乎是想挽住他的胳膊，又被他手肘僵硬的姿态提醒，再次放下。

这家商厦的大厅特别宽阔，像是一整个街区似的。我也在里面逛过几次，如果绕一圈，走得快的话，足足需要一刻钟，而且高度直达9层楼的穹顶。在最热闹的地段有这么大的空间，着实让人感觉气派和心情开朗。

坐在大厅中央咖啡吧软绵绵的座位上，抬起头，可以望见自动扶梯在9个楼层中穿行，还没摘尽的彩色纸带和亮闪闪的纸花从天穹中垂下来。这时候，最好是微微眯上眼睛，因为商厦的穹顶是全透明的。水流般的阳光正充盈着大厅的每一寸空间，尤其是正对天顶的这片咖啡吧。好不容易熬过了上海阴雨绵绵的季节，谁不愿意在休息日的下午，坐在这里尽情地沐浴阳光、发呆、做梦呢。

如果不是正好睡了个午觉，这个时候，也许我也乘着地铁来到徐家汇，带上一本推理小说，在几乎满座的咖啡吧里占一个座位，晒着太阳，翻着书，啜着卡布奇诺的奶泡。也许一抬眼，我就亲眼看到张约和徐鸣之向我走过来。也许我刚好占了唯一剩下的位置，他们只能快快她站在一边，等待约见他们的人。也许这样的话，后面的事情就会发生在我身上，或者任何一位在座的年轻女士身上。可是我不在那里。所以当她们向咖啡座走过来时，发现在最靠近外围的地方，还剩下最后一个空着的座位。一个小方桌，两个面对面的沙发座。

她们先是各自坐了一个沙发座，因为沙发座有点窄，坐一个人略嫌宽敞，坐两个人又嫌拥挤。他们当时都心不在焉，张约在看周围，而徐鸣之在留意着张约的表情，两个人下意识地就这么坐下了。坐了两三分钟，据说是服务生已经看见他们，还来得及把冰水和饮料单送过来，也许是徐鸣之发觉不对劲，提醒张约说：“可是，这样的话……她来了坐在哪里呢？”

张约于是站起身，徐鸣之往沙发里面让了让，张约挤着她坐下来。这沙发座确实太窄了，也许根本就是为一个人设计的。第二个人要是想让整个臀部坐进座位里，两个人就不只是手肘挨着手肘，简直是两个身体都紧紧贴在一起，分外亲热的样子。

这时候，6号服务生正好把饮料单递到张约手上，这是一个足足八开大的褐色皮面本子。张约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么挤，翻也不好翻。”又重新站起来，坐回徐鸣之对面去。

徐鸣之说：“这样她来了怎么坐？跟你挤在一起，还是跟我挤在一起？”恼怒的片刻，她白皙的脸上升起一片红晕。6号服务生正在欣赏这么细白的好皮肤，而这文静又纤弱的女人，忽然的这一下发作，让他也有些尴尬了。好在张约似乎料到她今天会有这么一下子，说：“别紧张，至于这样吗？”她站起来，又挤坐到她的身边，还故意往里再挤紧一点，一只手放在她手背上，用力握了握，对她露出一个足以让她安心的微笑。

徐鸣之点了一杯热的低因蓝山。张约要了杯冰摩卡。之后，因为阳光过于丰盛，连这位最勤勉的服务生都昏昏欲睡了一段时间。他只记得服务台接到过一个电话，说是找“张约先生”。他在各个座位间依次询问了好一阵，最后在徐鸣之诧异仰视的目光中，这个戴眉毛架眼镜的摩登男人起身走到吧台接了电话，但是电话已经挂断了。

已经是3点40分。张约拿了几本咖啡吧的免费杂志在翻阅，只坐了大半个臀部，斜着身体，半个背对着徐鸣之。在约定时间快要到达和已经到达的那一阵，他曾经表现得有些坐立不安，左顾右盼，现在他似乎已经拿定主意要让自己休息一下，整个人都钻进了杂志里。该来的、迟来的或不来的人，爱来不来吧。(摘自《瓶中人》，孙未著，作家出版社，2023年7月)

让科幻细胞融入小说的机体

——《神秘逝者的谵言》后记

李 门



一部社会科幻小说，要讲好中国故事，行吗？这是当时心中的自问。但我这样回答自己：作为一名普通作者，先别理会成与败，就来一次大胆的尝试吧。在当今这个纷繁复杂、风云多变的地球上，我们能做什么？风雨人间，星海茫茫。鞭挞假恶丑，称颂真善美，这是人们的基本良知；制止战争，追求和平，这是人类的共同愿望。让合作、共赢、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所积累的基本理念，成为人类的共同追求，这也是值得去做的一件事。

我一直以为，作为科幻小说，无论短篇或长篇，也无论硬科幻或软科幻，文学性都必须是作品的主体，科幻元素应如细胞一样融入小说的机体，不应让小说成为作者诠释科幻幻想的附庸。一部科幻小说出版后，人们的意见往往大相径庭，虽称其为“科幻小说”，但有人却认为它只是作者为表述某一科技幻想而设置的简单故事罢了。在这个故事中，人物缺乏刻画与塑造，仅有名字而已；情节的铺陈、细节的描写、内容的立意、语言的文学性，均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这样的结果如何呢？文学性与可读性较差，很难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被人们认同。究其原因何在？主要是科幻元素挤压了小说元素。

科幻小说究竟应该以科幻元素为主，还是以小说元素为主，还是二者应该并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千人有千人的看法，我个人的想法是：顾名思义，科幻小说即“科幻的小说”。科幻小说也是小说，它应该具有小说的特质，它被称为“科幻

小说”，只不过因为它具有科幻元素而已。科幻小说与其他小说一样，立意是灵魂，人物是主体，情节是骨架，细节是生命，语言是风采。必须将科幻元素天衣无缝地融入到立意、人物、情节、细节与语言之中，让科幻元素成为小说机体内部浩荡血液中的一部分。

《神秘逝者的谵言》这部小说，属于社会科幻小说，对所幻想的某一社会形态与面貌的展示，是我着墨的重点。婚姻、爱情、家庭以及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亦是我特别关注的地方。其中必涉及某些科技幻想，但对其原理，多是提及或简介，并未做过多阐释与演绎。在这部小说中，主体是地球、星体、宇宙以及人类的未来与命运，它所展示的是一个幻想的世界，或者说，它是现实世界的某种幻想。

科学和社会发展均达极顶的香登人，在宇航中发现了与自己形体相同的太阳人，心绪复杂，喜忧交加。喜的是在寻觅宜居星体的漫长时空中，在所遇见的千奇百怪的智慧生命中，太阳人是唯一的同类；恨的是这唯一的同类，竟被捷足先登的龟当人所控制。更可怕的是，太阳人正沿着龟当人当年的老路走去——科技虽达极顶，但因穷兵黩武而导致毁灭。如何拯救太阳人？怎么斩断龟当人强加在太阳人身上的桎梏？情况复杂，举步维艰。太阳人因龟当人介入而铸成的难改本性——残暴、好斗、贪婪、恃强凌弱等，也对拯救行动造成重重障碍。龟当、地球、香登，三个星体之间关系微妙、风云变幻，拯救行动时时刻

于波谲云诡、扑朔迷离的境地。意志坚如磐石的香登人与地球人中的佼佼者合作，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来之不易的胜利。

塔城、塔翎、欧阳哲、姚仁礼、陈东方以及山本野觉、加布里尔、贾志飞、阮明俊、刚者、战者和勇者，是我认真讲述的一批人物，特别是欧阳哲、姚仁礼两位中国人，他们的言谈举止与中庸、合作、仁爱、四海之内皆兄弟等中国智慧和理念密不可分。众多跌宕起伏的情节、细节，亦随这批人物的行踪而逐步推动向前。需要说明的是，不仅主角们需要认真刻画，山本野觉、“金色鬃毛”、“白色鬃毛”、阮明俊、加布里尔等次要人物，也需下足功夫，使他们有血有肉。这些人中，有一两位是在灵感闪烁的时刻突然出现，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历史和国度息息相关。

是否可以这么说？书中故事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缩影，也是幻想世界的一种展示。书中所呈现的是这样一个理想社会：没有暴虐、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物质极大丰富，一切需求均获得最大满足。这是一个自然人与智能机器人共生共存、不分彼此的社区。

在跨越两三个年头的写作中，我时时不由自主地沉浸在笔下流出的字里行间，被其中一些情节和人物所打动，即使搁笔，仍久久不能平静。书中那些人和事，仍在我面前蒙太奇般地呈现。我和他们总是形影相随、不离不弃，或伫立于激烈的星空战场，或穿越在浩茫无尽的星际，或无休无止地在黑洞中翻滚坠落……

一部作品，作者最渴望的是能够吸引读者，引起众多读者的共鸣。我在本书中，有心将自己所构思的理想世界呈献给读者，倘若能将撰写过程中的激情与感动，部分传递给读者，也便聊以自慰了。

(摘自《神秘逝者的谵言》，李门著，作家出版社，2023年2月)

上世纪70年代末，在四川成都的一次科幻大会上，我见到了著名的科幻作家叶永烈和童恩正，听了他们的演讲，并得到他们的赠书《小灵通漫游未来》与《珊瑚岛上的死光》，从而激起了对科幻作品的热情。科幻是个奇妙的东西，在某种情况下，比现实题材作品更能发挥作者的想象力，可让作者骑上飞奔的骏马纵横驰骋。于是在写现实题材小说的同时，开始构思科幻小说。

经过几年实践，我有了小小的收获，先后完成了《光的复活》和《星际飞来的女性》两篇科幻小说。按照一般说法，前者为硬科幻，后者为软科幻，且具体归类于社会科幻。经反复修改后，上世纪80年代末，这两篇小说均被省级文学刊物发表。与此同时，我的现实题材小说《野火》《夜色依依》亦相继在另一家省级文学刊物发表。应当说，这一时期我同时进行着两种小说的写作，所创作的30多篇中、短篇小说，集结成《有情无情》一书，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进入90年代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曾投入纪实文学、传记文学、报告文学的写作，暂停了现实题材小说的创作，也停下了科幻小说的写作。当然，这是人生中某一驿站之必然，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或者说是命运注定如此，没有什么好遗憾的。

2019年6月，我的长篇小说《情荡红尘》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不少读者建议我再写一部续卷。这样可将书中两个主人公的凄美故事延续下去。书中的女主人公鲁凤本已经死亡，但由于AI的介入而“复活”，从而圆了读者们一个美好的愿望。这是人们意想不到的一个尾声，也是让读者特别感动的篇章之一。这说明科幻的魅力是存在且恒久不衰的。

另外，男主人公曾凯力此时已患绝症，他所留下的大笔遗产，鲁凤是第一继承人。那么复活后的鲁凤(智能机器人)是否与自然人平等？是否享有人权、诉讼权、夫妻财产继承权等权利？法院该如何审理此案，又该如何判决？这又是一系列严肃的法律问题。对作者来说，故事情节或许很曲折精彩，却面临着一道又一道不易解答的难题。

这时我突然奇想：另写一部社会科幻小说吧！这想法如春风吹拂野草般地蓬勃萌动了。多年隐于内心的众多构思与积累，似激流般涌入大脑，脑细胞们兴奋得日夜难安。一个理想而恢弘的人类社会场景应运而生，人物、情节、细节等不约而同地找上门来，催促、鞭策、激励着我，冀望我写一部文学性、可读性兼备的社会科幻小说，当然更热望它成为一部好的中国故事。